

#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以裨治文为个案\*\*

□张施娟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摘要]** 受时局所迫,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无法直接传教,致力于各项文化活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流露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的心态。

**[关键词]** 裨治文;传教士;文明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5)02-0070-05

当今的文化交流,一般是双方同行专家借助于研讨会、座谈会等直接交谈方式或电话、因特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加以讨论。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除个别例外,一般不是同行专家的直接交流,往往以战争、贸易或传教为载体和媒介。这些文化交流的作用不是行为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往往是历史活动的客观后果。由于宗教在历史上一般来说是其文化的核心,至少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异质文化地域中传教,往往导致两种文化深层上冲突和融和,因而传教士必须对异质文化有基本的研究。所以传教为媒介的文化含量比战争和贸易所有的要高。<sup>[1]</sup>这一点越来越被国内的学者认可。中国学者过去普遍认为来华新教传教士是西方殖民文化的先锋队,而今,一般肯定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印刷、出版、教育、医药方面的促进作用,甚至有所拔高的趋势。本文考察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1861)为主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 一、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传教士经常是在两条战线上奋斗:一是使国外异教徒皈依为基督徒。为此,新教传教士以各种方式宣扬西方的文明,甚至不惜建议西方国家采取武力迫使中国“开放”并接受基督教。二是维持好来自国内的资助。虽然新教的传播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没有象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那样密切,但是,新教传教士和来华耶稣会士一样,需要国内的支持。

在两条战线上都必须经常不断地向同盟者或反对者提供证据。这就形成了两股书写文字材料的潮流:一股是为在中

国建立教会,开展传教活动而编写的小册子——翻译成中文的福音书及其它用中文写成的著作;一股是为动员、鼓励国内赞助者的支持而用英文写成的小册子、传单、讲演稿、文章和书籍。

1830年来华后,裨治文在居留中国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两股潮流中的中坚力量。他创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和“益智会”分别是这两方面的典型。

裨治文到达中国后,发现在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报纸”,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他们自己的“邸报”,但这些“邸报”只刊登与他们自己相关的事情,不少文章写得不求真相。所以裨治文希望能在澳门或广州建立一个传道会印刷所,以便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兴趣和支持,另外,裨治文还相信西方印刷技术的使用会有利于在中国传教。<sup>[2]</sup>

在马礼逊和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下,裨治文建立了今人所称的“广州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sup>[3]</sup>在此基础上,又于1832年5月1日创办《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旧称《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关于《中国丛报》的主要任务,从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中可知: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关于商业方面……关于社会关系方面……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sup>[4]</sup>可见,裨治文等人创办《中国丛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这符合裨治文来华前收到的美部会的指示信。在

\* [收稿日期] 2004-01-25

\*\* [作者简介] 张施娟(1974—)女,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那封很长的“指示”信中,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美部会做出完整的报告……”<sup>[4]</sup>这份刊物创办的终极目标就是传播福音。裨治文曾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写道:“愿它无论在其开端,还是在这之后,都全然成为主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sup>[4]</sup>

从《中国丛报》的内容来看,裨治文所阐述的宗旨基本实行。丛报共刊登约 1242 篇文章(根据卫三畏的目录统计),对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教育和风俗等。丛报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

《中国丛报》所有文章中与中国有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重点在中国国情方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丛报。笔者根据卫三畏编的《中国丛报》目录统计见如下表格(表 1)。

表 1 《中国丛报》刊登文章分类

类目	总篇数	裨氏篇数
地理学	63	21
中国政府与政策	81	17
税收、陆军、海军	17	3
中国人	41	12
中国历史	33	19
博物学	34	无
艺术科学和制造	27	7
旅行	27	13
语言文学等	94	30
贸易与商业	60	7
航运业	26	3
鸦片	55	16
广州外国商馆	36	11
外交关系	34	13
与英国的关系	38	16
与英国的战争	74	28
香港	22	4
与美国的关系	21	12
暹罗与越南	24	无
其他亚洲国家	21	4
印第安多岛屿	36	10
异教	53	4
传教	102	39
医药传教	48	6
圣经翻译	40	9
教育协会等	31	11
宗教	29	3
传记告示	38	8
杂撰	37	15
总计	1242	341
裨氏文章篇数所占比例		27.5%

《中国丛报》的作者主要以这一时期的所有各教派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主,另外还有一些英美商人,如美国商人查理·金(C. W. King)、鸦片贩子因义士(Robert Inglis),以及外交官如包令(John Bowring)、威妥玛(Thomas F. Wade)等人。撰稿较多的是裨治文、卫三畏、郭实猎、伯驾等人,其中又以裨治文发表的文章最多,可以明确是他写的研究性论文和评论就达 342 篇(见表 1),而文章数量仅次于他的卫三畏只有 120 篇左右,相差悬殊。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加上他撰写而且署名的消息评论,约有 2000 页以上的篇幅,基本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收集、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丛报》从 1832 年 5 月创刊,至 1851 年 12 月停刊,每月一期,从未间断。其中 1851 年 8 月至 12 月则合出一期,合计共为 232 期,外加索引一卷,共 20 卷。前两卷每期发行 400 份,到 1834 年第三卷时已增加到 800 份,第四卷已达 1000 份,第五卷则有 1000 多份。<sup>[4]</sup>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可观的数字。

《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 1836 年发行的 515 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 200 本,马尼拉 15 本,夏威夷 13 本,新加坡 18 本,马六甲 6 本,槟榔屿 6 本,巴达维亚 21 本,暹罗 4 本,悉尼及南威尔斯 6 本,缅甸 3 本,孟加拉,尼泊尔 7 本,锡兰 2 本,孟买 11 本,南非开普敦 4 本,汉堡 5 本,英国 40 本,美国 154 本。<sup>[4]</sup>可见销售区域之广泛。

《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的讨论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传媒。西方人正是从《中国丛报》上知道了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知道了鸦片战争的进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 1837 年 8 月 5 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sup>[4]</sup>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价值。

这二十卷的 Chinese Repository 不仅在当时是极有价值的史料,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中国丛报》的记载,在许多地方,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档案的不足。后世学者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时多引证该刊,对其评价颇高。

## 二、裨治文与“益智会”

为了让中国民众接受基督教,裨治文等人试图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从观念上改变中国人。

因为清政府的限教政策,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曾在广州隐居,他们发现中国官方直至民间有着强烈的天朝自大的心理,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有传教士

说道,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sup>[4]</sup>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裨治文等人在1834年11月发起创办“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简称“益智会”)。“益智会”成立以后,裨治文一直与郭实猎一起担任中文秘书。

顾名思义,“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裨治文自称“益智会”是站在“光明与黑暗两大地区”之间。他认为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可以使中国人的产品质量提高,从而使“他们和我们共同得益。”<sup>[4]</sup>

因此,“益智会”在中国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裨治文等人认为要优先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因为这个如此排外的民族,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的观念是非常混乱和不准确的,所以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历史和地理书。<sup>[4]</sup>

“益智会”不断提出一些出版计划。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不友好态度”,导致印刷、出版工作无法正常工作;而且缺少能用中文编写书刊的西方人。<sup>[4]</sup>所以这些计划大都未见完成。不过“益智会”还是出版了一部分中国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和郭实猎几乎包揽了益智会的所有编著,他们是这个组织的灵魂。

其中裨治文编著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当时“美国人写有关中国文化最具系统之书籍”。<sup>[4]</sup>裨治文以西方语言为标准,来对汉语进行评判,在他看来,中文的单字数量少、语法简单等特点,使中文与西方语言存在如此巨大的区别,使西方人难以掌握和使用。因此都可以说是缺点。<sup>[5]</sup>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则是第一本中文美国史著作,裨治文在书中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裨治文在书中表达了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文明程度之所以不逊于中国,得益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他在书中表达了“四海为一家”的意愿,目的在于瓦解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和“四夷”观念,使中国人抛开大中华文化优越感而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 三、裨治文与“马礼逊教育协会”

裨治文等传教士不但利用文字材料,还充分施展教育的功能传播福音。

在传教士们看来,教育是传教最有力的辅助手段,是传教士传道布教及训练宗教人才的重要措施,最省钱、最有效的

传教方法”

在各地传教站实施教育是美部会的传统。美部会建立传教站时会办学校、建印刷所,意欲通过教育改变当地的信仰,皈依基督,同时使异教社会的文化得益于美国文明。裨治文就相信,文明反对愚昧的伟大战争不仅包括获得宗教知识,也包括世俗知识,他说:“教育是提高人类精神文明和免除上帝惩罚的手段。”<sup>[6]</sup>

裨治文来华后不久就收中国少年在家学习,还组织教育团体。他和在广州、澳门的新教传教士以及英美商人为纪念马礼逊(1834年8月1日去世),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裨治文起草了章程并担任秘书。马礼逊教育会实际由裨治文具体操作,类似于“总代理人”的角色,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建议和决策,处理信件往来,挑选教师、书籍等等。

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到他们手中。<sup>[4]</sup>这是因为裨治文等人觉得,英语是中国人掌握西方知识的必要技术,有利于在中国传播福音。

裨治文对在中国推广教育有很大的决心。他在1836年11月9日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大会上说道:“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都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sup>[4]</sup>

早在马礼逊教育会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之前,裨治文已经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初等教育,作为举办教育活动之参考。他们在广州附近所调查的内容分为18个项目:人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种类、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儿童入学年龄、蒙学读物、教学法、儿童学习年限、每日学习时间、学校状况、学生人数、教师素质、教师薪金、考试、奖赏、惩罚。通过调查,他们获得了关于中国教育的第一手资料。<sup>[4]</sup>裨治文第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在《中国丛报》1835年5月刊号上就已发表。

该协会还鼓励外籍教育界人士大量捐赠图书,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另外,马礼逊教育会还向郭实猎夫人(Mary Gutzlaff)的私塾提供每年312元的资助。<sup>[4]</sup>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裨治文向西方一些教育机构呼吁派遣年轻教师来华。最后,耶鲁大学毕业生布朗偕夫人于1839年2月到达澳门,并在裨治文等人的指导下创办起“马礼逊学校”。裨治文经常和布朗一起利用教学活动传播基督教。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还多次刊登这些学生的习作。

马礼逊学校刚开始只有六名学生,他们是:容闳、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1842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到1850年,最终因经费拮据而关闭。

马礼逊学校虽然从创办到结束不过前后11年,但是受它的影响,一些美国传教士也相继在中国开展教育传教活动。

如第一个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叔未夫人(Mrs. Shuck)在香港创办学校,免费招收学生,不到三年学生人数就达26人。<sup>[4]</sup>

马礼逊学校的影响与成就,在近代史中有肯定性的地位。容闳、黄宽、黄胜等人都出自该校,多有贡献于晚清社会;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闳带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等无疑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的影响。“马礼逊教育协会”设立的图书馆,其中不少书籍,现存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马礼逊特藏”(Morrison Collection),以供学人研究参考。<sup>[4]</sup>马礼逊学校另有一个比较隐晦不显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一部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印象有所改观,间接地为后来中国的教会学校铺下坦途,也为基督教在中国顺利传播建立基础。

#### 四、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为了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裨治文和其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还充分利用西方的医学,发起组织了另外一个重要团体——“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医务传教的手段源于马礼逊。早在1820年,马礼逊就曾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顿(Doctor Livingston)在澳门向中国人发放药品。此后,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1827年在澳门设立一所药房,1828年起还开办了一家较小的眼科医院,就诊病人在四年时间里高达四千多人次。<sup>[7]</sup>

受在澳门的传教士影响,广州的传教士也设立了一家药房,向居住在广州的中国人发放药品。裨治文欣喜地发现,每天一早,就会看到生病、瞎眼和瘸腿的男女老少挤在药房门口。因此,他认为通过医务活动会有利于传教,极力建议美国会派遣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广州建立一家传教士诊所。

最后,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来到中国。他在1835年11月4日成立“广州眼科医院”。这个事件标志着以行医治病为主要手段的“医药传教”方法的正式确立。<sup>[8]</sup>

医院在开初阶段即获得很大成功,《中国丛报》报道说:“在六个星期的事件内,我们看到有450名病人得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医治。”<sup>[4]</sup>因此,裨治文更加确定,传教士的医务活动会提高传教士的声誉,从而为传播福音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裨治文和伯驾等人呼吁各国派医药传教士到中国服务,借医务工作进入中国社会传教。裨治文说,“医院不仅能治愈病体,从而展现‘蛮夷’的技术和善良,而且能有大量绝好的机会为有精神疾病的人服务。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这种机构永远存在。”<sup>[9]</sup>

在裨治文等人的倡议下,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在1838年2月宣布成立。郭雷枢任会长,裨治文、伯驾、查顿、因义士等人任副会长。裨治文等人起草并发表一份关于医药传道会的宗旨和规则,宣布该组织的宗旨是:

通过为中国人治病,向他们传授医学知识和上帝的福音,使他们消除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民族排斥情绪,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仇视的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摆脱苦难。<sup>[4]</sup>

可见,裨治文等人做医务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从而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教义。

在医药传道会主办下,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维持了好几年,它的病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给传教士提供了大量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与偏见,也给后来的中美谈判带来便利。

裨治文、伯驾等人倡办的广州眼科医院,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西方医学院,孙中山曾就读该院,其后数度合并成为中山医学院。

由于医药传教比散发宗教小册子和在民众中直接布道更为显著,欧美各教会组织十分重视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工作,及至五口通商,医药传道会所属医生均在各地设立医院。对于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医院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家不难认识。陈邦贤谈及新教传教士开设的医院时说:

“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且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传布西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sup>[10]</sup>

而医药传道会向这些传教士开设的医院和药房提供资助。可以说,中国近代医院之发展,与中国医药传道会有直接联系。

裨治文等人为了传播福音,打破中国的四夷观,证明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也不是文明唯一的中心,改变中国人的排外思想,他们通过教育、出版、医药等方面的活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发达文明。他们的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医学等方面的发展。但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用传教士自己的话说:不仅使中国人同外国人更加广泛地友好交往,而且传播欧美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向他们宣扬上帝的救世福音,消除盘绕在他们脑子里的迷信思想。<sup>[4]</sup>

在传播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来评判中国,不自觉地流露出文明优越的姿态。上文所列几项活动,都开创于鸦片战争爆发前,因为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力相随,裨治文等人在中文书籍中表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是小心翼翼的,但在主要向外发售的《中国丛报》上,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大肆批判和文明的优越性暴露无疑,裨治文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是很快就进入现代进步的进程,还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人所追求的事业。”<sup>[4]</sup>

各种文明并没有先天的高低,固执中国文明优越的观念是不正常的,同样,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以为西方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同样是不正常的。

如何对待异域文化,首先有个出发点的问题。不管哪个民族或哪个人,在空间上无疑都会取自己所处的位置,作为视野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以“我”为中心,或以我为本的倾向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主要倾向。<sup>[11]</sup>

#### 参考文献

- [1] 陈村富. 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J]. 世界宗教研究. 2002(1):11
- [2] Eliza Bridgma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M]. New York: ADF. Randolph 1864, 59-61; 20-27; 74.
- [3] 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2, 94-95
- [4] Chinese Repository[J]. vol. 1: 1-5. vol. 5: 159; vol. 5: 160; vol. 5: 159-160; vol. 2: 186-187; vol. 5: 508; vol. 6: 335; vol. 5: 509-512; vol. 3: 1-7; vol. 5: 375; vol. 5: 376; vol. 6: 232-241; vol. 6: 230-232; vol. 6: 21; vol. 4: 386; vol. 7: 32-44; vol. 13: 649.; vol. 7: 1
- [5] 李志刚.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纪念裨治文牧师到广州传教一百六十周年[A]. 基督教与近代化中国论文集(二)[C]. 台北: 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1993. 36, 45
- [6] Suzanne W. Barnett, J. K.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5
- [7]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M]. New York, London: Willey & Putnam, 1848. 344
- [8]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M].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1. 122.
- [9]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M]. New York: Lewiston, N. Y., 2000. 108
- [10]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1. 189-190
- [11] 钱林森等. 文化: 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15

## Bridgman and the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ZHANG Shi - jua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tringent regul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arly Protestants added greatly to the West's store of knowledge about China and transmitted an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own civilization to the Chinese for mission. And they think that the western's civilization is beyond to Chinese.

**Key Words** Bridgman; missionary; civilization

(上接第 53 页)

##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Tre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LU Wei

(China and America Historical Allied Institute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study of the theoretic, the realistic and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formation of the conservativetre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ncludes the influence by Confucianism, the social climate after the Opium War, cultural absolutism, xenophobia and the deep rooted mentality of antiwesternization. The conservatist trend block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ough Confucianism is of certain help in the meantime.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conservatism; Confucianism

#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为个案

作者: [张施娟](#), [ZHANG Shi-juan](#)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28](#)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2)

## 参考文献(28条)

1. [陈村富](#) [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期刊论文]-[世界宗教研究](#) 2002(01)
2. [Eliza Bridgma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64
3. [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 2002
4. [查看详情](#)
5. [查看详情](#)
6. [查看详情](#)
7. [查看详情](#)
8. [查看详情](#)
9. [查看详情](#)
10. [查看详情](#)
11. [查看详情](#)
12. [查看详情](#)
13. [查看详情](#)
14. [查看详情](#)
15. [查看详情](#)
16. [查看详情](#)
17. [查看详情](#)
18. [查看详情](#)
19. [查看详情](#)
20. [查看详情](#)
21. [查看详情](#)
22. [李志刚](#) [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纪念裨治文牧师到广州传教一百六十周年](#) 1993
23. [Suzanne W;Barnett J K;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tings](#) 1985
24.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1848
25.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1861
26. [Michael C;Lazich E C](#) [Bridgman \(1801- 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2000
27.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 1981
28. [钱林森](#) [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